

第三版

毛澤東神權時代

許
行著

版

683491

D652
921

港台書室

許行評論集之三

毛澤東神權時代

許 行 著



90080167

Xing

2nd Floor

開拓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神權時代

作 者：許 行

出版者：開拓出版社

九龍中央郵局郵政信箱72910號

排 字：鄧氏兄弟資料研究出版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頓道28-34號莊士敦大樓七樓C室

承 印：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A4

1987年10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1988年4月再版

1988年9月三版

自序

這本集子所輯的，主要是我於一九七二年至七六年間所寫有關中國問題的時評文章。那時候，「文革」的狂飈已經過去，林彪已經碎屍在溫都爾汗，政局正進入狂左的毛江派和周恩來穩健派之間迂迴曲折鬥爭時期。這個時期最後以周、毛先後作古和四人幫垮台而告結束。那時候，毛澤東已進入暮年期，他已從「四偉大」和萬壽無疆的神化巔峯變成帕金森症的患者。雖然如此，但他的權威仍是不可搖撼的，任誰都不敢向他的權威作公開挑戰，因此他的片言隻語，那怕是昏庸和糊塗的，仍被尊奉為最高指示。

毛澤東從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開始，顯示他是一位深懂軍事和政治韜略的領袖。他的個人崇拜地位實在是從一九四五年第七次黨大會通過全黨路線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那個時候開始。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個人崇拜驟然上升為神權，同伊朗今天的霍梅尼一樣，以迄他逝世為止。本書這批時評文章所評的就是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故取名《毛澤東神權時代》。同時我又將四篇有關論述毛澤東著作的文章輯在一起，作為附錄。

文章距今雖已十多年，但當時各種事件的形象還是歷歷在目，可以作一種歷史回顧的參

考。此外，我還會就當時有關的一些理論問題作了某種程度的闡述，其中包括社會主義與民主問題、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中國當前社會性質問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變異問題、中國歷史分期和法家思想本質等等。

不過我得說明一點，那時候我還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我從少年時代開始便喜歡閱讀馬列主義書籍，相信馬克思古典著作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真理，而斯大林和毛澤東所推行的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因此我當時對中國問題的評論，是從馬克思「國家消亡」學說觀點出發，站在社會主義民主的立場去批判毛澤東獨裁的。

毛澤東神權時代結束之後，中國經過華國鋒的短暫過渡，便進入鄧小平的經濟建設時期。經濟建設令我考慮到許多有關經濟建設的實際問題，也促使我對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法權」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重新加以考慮。

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是日本和西德在戰敗殘局中迅速的復興以及東南亞「四小龍」的崛起，令人看到市場經濟的顯著活力。反觀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下那種大鍋飯式的磨洋工狀態，不能不感慨萬千。

馬克思的最終理想是共產主義，這是一種產品直接分配的社會，因此他認為到了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財富湧現的時候，人類便會超越資產階級狹隘法權的界限，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處」。

列寧及其同志憑着這種理想，曾在俄國革命初期沒收一切土地、工廠、企業和房屋，禁

止一切私人工商企業，取消銀行，貨幣不再成爲合法交換的工具；全國城市人口都變成是國家的工人和僱員，國家免費供應他們以衣食住書報醫療教育娛樂等等；國家對農民則實行餘糧徵集制。這就是著名的「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它從一九一八年起以迄一九二一年三月蘇共第十次大會通過新經濟政策爲止。「軍事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取消市場、實行直接分配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初步嘗試，它使蘇聯在內戰時期的經濟困難百上加斤，造成嚴重饑荒。

後來列寧自動出來糾正「軍事共產主義」錯誤，但他祇將糾正當作是生產力低下時無法逾越資產階級法權來處理，因此認爲俄國在小私有者自發勢力圍困下，不能不對農民、小商人、文明的資本家和外國資本採取「贖賣」式的暫時讓步，而讓步的目的在於引導小私有者自發勢力受控於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以便利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就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精神。列寧始終未能了解到市場經濟之不可取代性。

市場經濟不是舊制度殘留的一種法權，它是人類經濟生活日趨複雜化而自然形成的產物，它是千變萬化的供應和需求之間自然調節的機制，不是任何其他手段或方法所能代替的。社會越文明，這種機制越趨公平化和合理化。政府的作用，不是取消這種機制，而是取締一切足以破壞機制在公平和合理基礎上進行的腐敗行爲；同時推動機制，使它在促進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道路上發揮最大的作用。日本通產省和大藏省對重點企業的行政指導（產量過多時建議減產、投資過熱時規勸調整、價格不合理時參與制衡等等），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和貿易發展局對企業技術改良和海外貿易的開拓，都是顯著的例子。

對共產黨國家經濟發展緩滯的現象，過去我祇歸咎於官僚體制，以為這是官僚管理的結果，祇要實行管理上的民主，問題便會迎刃而解。現在我知道問題並不這麼簡單。共產黨國家除了官僚體制阻礙經濟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所實行的財產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破壞了市場機制。而官僚體制實質上就是建立在國家對經濟集中控制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官僚體制、國有財產和計劃經濟是三位一體，互相依存的。國有財產提供官僚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官僚擁有國有財產的支配權之後必然採取強化的集中控制的管理方法，由此自然產生他們那一套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

於是當代世界擺在我們面前的顯然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一個是計劃經濟體系，它以國有財產為基礎，實行官僚管理，生產因失去私有產權的誘因而缺乏活力，供求因缺乏市場機制而發生脫節，經濟生活上的行政命令不僅敗壞了經濟效益，也造成了大量浪費。另一個體系是市場經濟，與它相伴而生的是自由競爭和私有產權。沒有自由競爭便沒有市場的活力，沒有私有產權便沒有自由競爭的活力。因此市場、自由競爭和私有產權也是三位一體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之所以在經濟的顛簸中有巨大的生命力，產生貝爾所稱的「後工業社會」、奈斯比特所稱的「信息社會」或托夫勒所稱的「第三波」衝擊，基本上都得力於市場經濟。西德和日本從戰敗的廢墟中重新興起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及東南亞「四小龍」的起飛，也都得力於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事實表明，市場經濟不是在衰亡中，而是以更大的能量在發展中，以致原本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被迫引進市場經濟，拿它作為起死回

生的救命手段，發明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那些發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名詞的人，他們企圖在保持對社會主義信念忠貞的掩護下引進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將它同計劃經濟相揉合。但是如我上面所說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體制，真正的揉合是不可能的，任何程度市場經濟的引進，都必須以相等程度放棄國有財產和指令經濟為代價。

當然我歡迎這種引進，因為它是真正能推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道路。況且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放寬對自由競爭和私有財產限制的尺度，足以促使個人在經濟上獨立地位的增長，讓個性解放、獨立思考以及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多了發芽滋長的土壤。

這就是我今日的觀點。借着本書出版的時刻，順便表達了今日的觀點與十多年前觀點不同的地方。

一九八七年九月

1
21 11
社會主義與民主（一九七二年五月）
不是「人民」的人民（一九七二年六月）
——訪問大陸來的「流浪仔」
中共領導的幾個類型（一九七二年九月）
用群眾運動方式製造不出文藝（一九七三年四月）
鄧小平在毛周聯權中復出（一九七三年五月）
中國文藝百花凋零（一九七三年七月）
王洪文冒升與張鐵生交白卷（一九七三年九月）
中共航空人員在西雅圖過的仍是封閉生活（一九七三年十月）
毛澤東與秦始皇（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目錄

193	184	172	162	151	141	132	124	116	110	104	98	90	84	74	
批判《水滸》運動的來龍去脈（一九七五年十月）	論資產階級法權（一九七五年四月）	人民代表大會竟在秘密中召開（一九七五年二月）	社會主義的癌變（一九七五年一月）	香港的「中國認識運動」另放異彩（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談中共對秦朝的新評價	哈哈鏡下的歷史面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批孔・楊榮國・學人與真理（一九七四年十月）	中國青年的心態（一九七四年九月）	毛澤東又想利用大字報運動（一九七四年七月）	毛澤東與法家（一九七四年六月）	鄧小平的「三個世界論」（一九七四年五月）	文藝調演和《三上桃峰》（一九七四年四月）	「批林批孔」——黨內權力鬥爭的新發展（一九七四年三月）	權術政治運用的實例（一九七四年二月）	「仁政」與「有教無類」（一九七四年一月）

312	307	293	285	282	273	260	257	248	240	235	222	209	201	
中國外交政策「大右進」	論李一哲大字報	論社會主義教育	一位偉人之死——悼周恩來	周恩來逝世後權力重分配的預測	停止派系鬥爭，由人民抉擇道路	「四·五」天安門暴動	誰得人心？	——泛論「反右傾翻案風」	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局勢	朱德逝世有感	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修正版	唐山大地震	一代巨人溘然殞逝——悼毛澤東	千秋功罪試評說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一九七六年一月)	(一九七六年一月)	(一九七六年二月)	(一九七六年三月)	(一九七六年四月)	(一九七六年四月)		(一九七六年五月)	(一九七六年七月)	(一九七六年七月)	(一九七六年七月)	(一九七六年九月)	(一九七六年十月)

附錄：

325 一本不願再見人的書（一九六七年六月）

——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

335 從《毛選》談到毛澤東的早期著作（一九七六年十月）

351 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著作（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366 華國鋒出版毛澤東著作的頭痛問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社會主義與民主（一九七二年五月）

中國應該走怎樣的道路，這是全中國人民都要關心的大問題。在大陸和台灣，大家同樣關心這些問題，只是有口說不得真心話，無可奈何。海外華人既然有了說話的自由，責任自然更大，更應該窮一己之所見，相互琢磨，將問題談個清楚。

近一年來，因為「中國熱」在西方國家流行，使得本來對祖國沉默的海外有識之士，都注意起中國問題來，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不論他們的意見如何，即使是分歧，也沒有關係。對於這麼一個大的問題，沒有分歧，倒是奇怪的事情了。

一般說來，在海外華人有識之士之中，盲目反共的宣傳，已越來越沒有市場；一般趨向於面對現實、側重理智、進行認真觀察和分析的態度，比較普遍。海外華人對中國問題的態度，大體上有兩個主流：一個是基本上贊同中共的一切措施，認為這是引導中國走向獨立、富強唯一可行的道路，縱使它在實行中有某些偏差，那也是無可避免的；另一個是承認中共

在國家獨立、經濟建設、科學發展和國民性改造等方面有成就，但抱怨它沒有民主、自由和個性的發展。因此，在後一類人之中，多數希望中共走「修正主義」的路，即修正它那教條的、好鬥的路線，走一種比較開朗的、溫和的路線。但也有人覺得「修正主義」固然比死硬的路線好，仍嫌不夠，最好能治民主與社會主義於一爐，行「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究竟怎樣才是民主社會主義，似乎還缺乏具體的意見，本文想從這一方面作一初步探討。

從《明報》的討論談起

今年三月一日，《明報》發表一篇題為《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的社評，希望大陸改行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希望台灣「也能朝着這方向演變，政治上趨向民主自由，經濟上趨向社會主義」，最後大陸與台灣雙方和平統一。究竟社評作者所講的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是怎樣一種類型的呢？他說是「類似北歐各國（例如瑞典、挪威）」那樣的，雖然作者在三月三日的社評裏補充說：「將來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勢必比北歐各國更加徹底，那將是中國自己的一套社會主義。」

這篇社評，在該報上引起一陣子討論。項莊先生完全站在反對的立場。他說：「我想了幾天，無法想像社會主義與民主自由怎能並行不悖，至少以往還沒有過這樣的例子。」爲什麼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會積不相容呢？項莊先生認爲社會主義必定要「實施生產國有的計劃

經濟」，「經濟受管制等於一切受管制。你的飯碗操縱在國家（其實是統治集團）手裏，只有它作你的主，那有你作他的主？」（見《與君一夕談》刊三月十六和十七日《明報》。）

整個討論過程之中，還有許多位發表了高見。

在我看來，社評作者的社會主義觀念，實質上只不過是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因為他以瑞典、挪威的「民主社會主義」作為藍本，同時又將英國、澳洲、紐西蘭、以色列和非洲某些國家都視為民主社會主義（見三月廿四日《明報》社評）。以這樣的社會主義觀念去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前途，未免有點枘鑿。中國全國沒收資產階級財產已達二十年左右，能否再容許退回到改良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來，是大成問題的。

那末中國不退回改良資本主義的道路，是否表示中國永遠沒有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呢？項莊先生的答案是悲觀的，他認為民主自由與社會主義是根本不能相容，「除非你把三民主義當作社會主義，把羅斯福的新政和英國工黨的施政也當作社會主義」，或者將自由民主打個折扣，「說南斯拉夫人民有了自由民主，蘇聯人民也有了自由民主。」（見同上引《與君一夕談》。）

將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根本對立起來的觀念非常普遍，它不僅存在在所有反共人士的腦子裏，同時也存在在許多親共人士的腦子裏。不過親共分子另有一套自我安慰的想法。他們認為中國地大人衆，過去一窮二白，長期受列強欺負，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像中共那樣，怎能建立起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弦外之音，似乎說，要建立社會主義，必定要犧牲

一些民主自由。

至於中共的官方理論，從來沒有否認中國沒有民主，他們認為自己所實行的是階級民主，只允許人民有民主，反動派不能有民主。話雖這麼說，實際上不但人民沒有民主，連共產黨內也沒有民主，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正因為事實上沒有這種民主，才會使人產生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根本對立的觀念。

究竟社會主義和民主自由是否根本對立呢？我認為它們不但不對立，反是相輔相成的。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民主

在馬克思之前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中，沒有人正面談到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但實際上，不論傅利葉的「法倫」（公社）或歐文的「公社」理想，都是一種民主的組織。前者根據人類的情慾而設計，它的最高領導機關是權威評判會。傅利葉之所以強調「權威評判」，因為他着重正當意見的說服力，反對任何強迫的法律和規章。歐文的「公社」，最高的立法權是屬於全體公社社員的。

受人們詬病得最厲害的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一般人都說現在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就是從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中來的。這種說法是否說得對，還值得加以探究。

在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就是「國家消亡論」。毛澤東在取得